



雨后的早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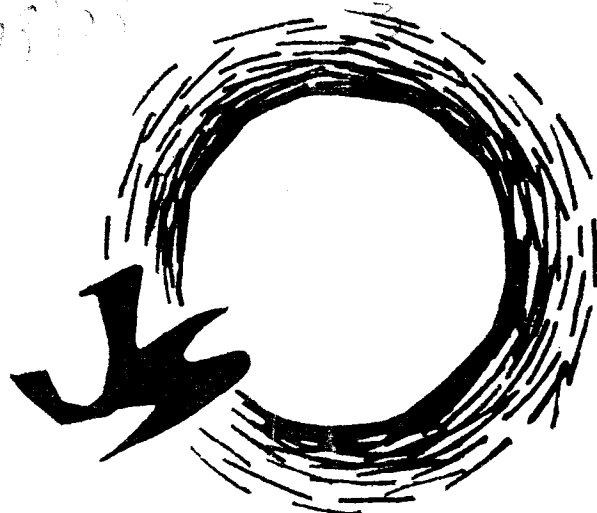
李沙铃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7.5
5

I247.5
2875

11/28/23



雨后的早晨

李沙铃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雨后的早晨

李沙铃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5印张 1插页 141千字

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000

ISBN 7—224—00144—9/I·39

定价：1.65元

第 一 章

幸福的斗争不论它是如何的艰难，它并不是一种痛苦，而是快乐，不是悲剧的，而只是戏剧的。

——车尔尼雪夫斯基

一辆奶油色的丰田牌越野小汽车，在高原城南郊外的柏油路面上，轻松自如地向前穿行着。高原的冬季，马路两边的杨柳树早已脱去了绿衫，但躯干依然是挺拔的。远处近处积存的片片白雪，好象是给大地特制的点缀品，人们并不嫌其多余。麻雀儿真有本事，这么冷的气候，什么可食的东西几乎在地面上都找不见了，可它仍然吃得肥肥胖胖的，还不时地栖在街头的电线上东张西望，欣赏着自然界冬日的景色。郊外比城里安静，怪不得星期天人们总是喜欢领着爱人和小孩，在旷野里随便走一走。实情就是好啊！

现在，乘这辆丰田越野车的人，并不存有什么焦急的心情。因为——一不是去走亲戚，二不是去看爱人，而只是去偿还久久压在心头上的纯属事业中的一种愿望。眼看着车子就要转向去监狱的马路了。

确切地说，坐在这辆车上的只有两个人，除了青年司机小田和他小孩丢下的那个布娃娃外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

小田当过义务兵，前几年才转到地方来工作。可能是抓方向盘的职业养成了他不大爱说话的习惯，我坐在车中感到

寂寞。其实我的思想并不寂寞。他开他的汽车，我想我的往事……

我年轻时就是作新闻记者的，肩上挎的那个草绿色的背包，总也取不下来，一年四季满天下地跑，天天都要接触新人，听到新事，看到新景。愉快极了！

后来，中国出现了怪事，不知道谁发明了“扩大化”，我也被扩大进去了，戴了一顶冬暖夏凉的“四季帽”，重新作人，脱胎换骨。感谢上帝！我总算把那顶“四季帽”脱下来了。然而，天不作美，“四季帽”又被换成了“摘帽帽”，无论走到哪里，人们都指着脊梁说，“摘了帽的就是他！……”没完没了。有一回，一位“同行”悄悄告诉我，他听人讲，外国人把中国的右派当成老虎，经常产生谈虎色变之感。我听以后，微微地置之一笑。

这是什么原因？连我自己也不明白。嘿嘿！大概是出于戏剧的原因吧。于是，我离开了我亲爱的报社，离开了我经营过多年的职业，来到监狱里当了一名“有问题”的管教员。戏剧，不折不扣的戏剧！身为没有标记的“犯人”，又要监管服刑的犯人，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！不是说生活就是戏剧吗？

我的一位少年时候的同学来信给我指出，是我的命不好才产生如此悲剧的，而且论证道——人的命运就象随风飘摇的树叶，飘到大海里，便可以漫游天下；飘到多情姑娘的书页上，就可以当作珍贵的书签保存下来；飘到马路上呢，则要被千百万行人践踏；如果飘到茅厕里呀，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啊！笑话！“我心如秤，不能为人低昂。”我相信诸葛亮这句话。

在十几年的管教员阵营里，我几乎过着一种印花布式的图案生活——

早晨，我踏着红灿灿的朝霞，走进监房的大院里，站在我经常站的那堵青砖砌的花墙旁边，用不着下什么命令，他们就一个个地从号子里出来，自觉地站好队伍，接着，由值星员点名，实际上是一种报数仪式——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……他们边报边向右看齐，然后又自动地蹲下，表示自己圆满地完成了报数的任务。这一切都做得尽善尽美，滴水不漏。

“报告管教员，够了。”值星员立正向我禀告，煞是认真。由于这项活动司空见惯，值星员便把“人够了”的“人”字省略掉了。也妙！

我只轻轻地地点一下头，他们便马上排成三路纵队，小声地讲着千篇一律的没有任何新鲜味道的话语，说不上是一种中国人的责任心驱使，还是一种囚犯的赎罪行为，反正，他们嘻嘻哈哈地走进工房劳动去了。

我向荷枪站在围墙岗楼里的武警扬一下手，表示一切都很正常，便慢步进入工房办公室。被服生产开始了，我的心是坦然的，没有必要故弄玄虚地去指手划脚，他们会很自觉地执行个人岗位责任制。有时，我在工房里也转来转去，也摸摸剪刀，也踏踏机子，也看看流水线；或者，找他们中间的某一个人，个别谈话，开导思想，如果讲不通也发发脾气，维护国家监狱管教员的威严……

夜晚，情景改变，我踏着白花花的月色，又走进了监房。不是监管他们生产，而是掌握他们学习。我坐在一把他们早已给我准备好了的帆布马扎上，喝着自己带来的茶水，看他

们读报，听他们讨论。——认罪服法，遵守监规，改恶从善，前途光明。他们很会讲大道理，也很会联系实际，说到要紧的地方，常常把自己骂得一文不值，甚至伸手打自己的脸——“混蛋！坏蛋！王八蛋！”今天如此，明天还是如此，这种场景似乎有些太单调了。但是，监狱的生活内容却是一如既往地这么编织着。不打紧的。他们习惯了，我也习惯了。

这些，看起来好象是一张单线的平面图，一目了然，但要究其根底，却太复杂了。那里面同样是一个有血、有肉、有思想、有观念、有家庭、有爱情、有七情六欲的“奇妙”的世界。要从脸谱来观察，真是变幻莫测，有哭脸，有笑脸，有愁脸，有红脸，有白脸，有黑脸，也有花脸。各色俱全，百态千姿。

我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在这个奇妙的世界里工作，我从过去的热情，变得冷漠；又从冷漠，变得严酷；再从严酷，变得容易激动了。我着实地“爱”上了他们，尽管在法规上我们之间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然而在人格上我们却是平等的。

戏剧，十足的戏剧。他们好象在演戏，我也象在他们中间演戏。难怪艺术大师们指出，生活是艺术的源泉，艺术又是生活的再现。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大舞台，人人都是舞台上的演员啊！

我在想，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的我的监狱工作和囚犯们的监狱生活，不正是一部活生生的戏剧吗！它不是悲剧，也不是闹剧，它只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“是戏剧的”。监狱工作实在是其味无穷啊……

好！监狱大门到了。

小田刹住了“越野”，我下了车。

变了，啊！完全变了。监狱大门焕然一新，五层办公楼拔地而起，我当年带领犯人种植的小杨弱柳，现在都已长大成材了，那土地，那花草，那工房，是多么的稔熟亲切啊！我感到兴奋，格外的兴奋。我深切地意识到，任何职业，只要是个人曾经付出过劳动代价和心血汗水的，这里面都饱浸着爱的汁液。我产生了一种重返故园的强烈的精神欲念……

对！我看见了，囚犯们都住进了四层高楼，阳光充足，被褥整齐，食具干净，地板光滑明亮。

我看见了，每层楼都开辟了电视室，三大间宽，矮凳成行，窗帘扫地，纸花挂顶。

我看见了，各个中队都设置了图书室，排排书架堆满了名著，精神营养丰富无比。

我看见了，球场宽敞，花墙别致，众人围观，掌声震耳。

我看见了，囚犯们精神振奋，生龙活虎，这边歌唱，那边对棋……

我看见了，不，又好象没有看见。是我丢失了什么？又好象是忘却了什么？对，全丢失了，全忘却了，——过去的土房，破墙，纸糊的顶棚，东倒西歪的木棍围起来的厕所，没鞋污衣的泥地土路，还有那不敢声言只在肚里骂娘的不高兴的面孔……

这是涂在画面上的黯色，影影绰绰的，模模糊糊的，已经很不鲜明了。但它是那个消失了的岁月的背景，用漂白粉是洗不下来的。洗星海说得好：“每个人在他生活中都经历

过不幸和痛苦。有些人在苦难中只想到自己，他就悲观、消极、发出绝望的哀号；有些人在苦难中还想到别人，想到集体，想到祖先和子孙，想到祖国和全人类，他就得到乐观和自信。”

我沿着盖起的监楼墙根向前漫步，我又回到了逝去了那个充满戏剧情节的岁月中……



第二章

真理是时间的女儿，不是权威的孩子。

——布莱希特

真理往往非常朴素，以致人们不相信它。

——列瓦尔特

真理就是具备这样的力量，你越是想要攻击它，你的攻击就越充实了和证明了它。

——伽利略

我们见了面。

“欢迎你到监狱里来工作。这很好嘛！前几天就口传你要来，我格外的高兴。”他讲话彬彬有礼，没有带刺的字眼，令我感到少有的亲切，但仍可以听出他讲惯了官话的腔调。

“赵监狱长，不知道领导上打算分配我什么工作？”我大胆地提问。

“五中队管教员。负责思想工作。”赵监狱长拿出一根香烟，在茶几上弹了几下，还没有顾上点火，又平静而和善地问我，“你读过马卡连科的《教育诗》吗？”不等我回答，他一口气地说了下去：“那可是一部洗涤人类灵魂污垢的赞美诗啊。初发表的时候，并不那么容易，一些出版界的有权人，总认为那不是文学，横竖刁难。马卡连科灰心了。

不料，一天，高尔基和他聊起天来，高尔基说，让我看一看。马克西姆看后，拍手叫绝，执意举荐，结果，《教育诗》问世了，后来成为世界名著。”

赵监狱长讲到这里，爽朗地笑了：“可见，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门徒的马克思主义出版家，却不懂革命人道主义的文学，这岂不是和马克思主义开玩笑吗！”

“赞美诗”。他讲得多贴切，多动人。足以证明他把《教育诗》溶化在自己的监狱工作里了。我在五十年代中叶就读过它。我写过读书札记。我喜欢马卡连科和他的《教育诗》。

“您很有眼力。”我刚说出这句话就后悔了，这是不是对一位新上级的奉承吹捧？运动搞得太多了，真话和假话把自己也弄糊涂了。

“不是我有眼力，而是书籍本身的魅力。做劳改工作、劳教工作的人，如果不读《教育诗》，那就等于他没有念过‘人之初’。你说对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这时，我偶生意外拾金之感。过去的多年，我到处采访，竟没有一次到监狱里来，这儿人称“不敢去”的地方，没料想还有如此懂得国法人情、深明大义的领导干部，我甚至发现他身上有一种专为温暖别人的特殊的光。我不禁在心中默吟起果戈里的话来：“如果有一天，我能够对我的公共利益有所贡献，我就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”

赵监狱长有三十八九岁，大约比我大十二三个年轮，中等身材，穿一身黑呢中山服，偏分头，过早地添了几缕白发，听口音象是北方人。我推测他没有念过大学，也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学历，完全是在“红学堂”里锻炼出来的。稳

重，有主见，爱读书，遇事沉着善思。这样的监狱领导者，也算难逢。

“赵监狱长，我作管教员恐怕不合适吧！”

他轻轻地一笑，并非是真笑，从椅座上站起来说：“你有余悸，我是知道的。从目前的理论上讲，右派就是反动派。但就具体人来说，那可就不能一概而论了。你这个王重国，我们还是有所了解的，不就是学生出身的三门干部嘛，文章写得好，都称你是神童记者。有些人把你当成狼，我倒看你象一匹小马驹。好好干吧，我们对你是寄有很大希望的……”他抽着香烟，在会议室里走来走去。

我暗暗地流出了眼泪。信任，原来在这个不平凡的年代里并没有熄灭。我的冰冷的心，又慢慢地热了起来。

五中队的办公室非常简陋，几张木桌，几把坐椅，一台555牌挂钟。墙上除了毛主席的彩色挂像外，就什么都见不到了。我兴冲冲地收拾好自己的办公桌，把闪光的红宝书摆得整整齐齐，红墨水、蓝墨水、回形针、大头针，一字排开，就等着正式办公了。我有文化知识，读过许多书，我还很年轻，精力旺盛，特别是我没有家，一个光杆司令，吃住都在中队里。管教工作，我能做好的。

“日他达，你听说了吗？”

“什么新鲜事？”

“咱们中队来了一名新管教。”

“从哪儿调来的？”

“他妈的，祁连山下的右派队。”

开头说话的是“老革命”常自亮，他扛过枪，踏过霜，抗美援朝跨过江，红鼻子，黄睫毛，一圈络腮大胡，旧黄军

装的胸口，印满了大小不同的油点点，好象自然图案。出于革命的阶级本能，他对我的到来，非常气愤，“赵监狱长的屁股，坐到哪个阶级立场上去了，右派竟能当管教员，那还要我们做什么！真是敌我不分！”

“常管教员”，在一旁整理材料的仓库保管李石昌说：“兴许赵监狱长了解过了呢，上级能派人来，总是有点原因的。我是个工人，不识文断字，前些日子也听人说，这个小王的笔杆子很硬，咱们监狱工作也需要这样的人呀。”

常自亮吸了一下掉在嘴边的清鼻说：“什么笔杆子？日他达，黑笔杆子！难道反右派白反了吗！”

五十二岁的李保管没话回答了，一边收拾缝纫机零件，一边慢腾腾地说：“还是常管教的立场稳，我真佩服你。”

不是吗，我虽摘了帽子，常管教还是叫我右派。

刚才的一问一答，泾渭分得多明！我已预感到我今后的岁月会更加艰难。可我却不服气——大学毕业，新闻记者，共产党员，我算什么右派！……然而，这些内心的潜台词，只埋在我的胸腔里。

我坐在办公室的木椅上，翻阅犯人花名册，察看犯人档案，学习“改造第一，生产第二”的方针，熟悉监规纪律条文，了解干部记载的《值班日志》……“只要是党的事业，都是神圣的事业。”我知道，一个人最大的痛苦，不是丢了金钱，也不是丢了瑰宝，而是丢了工作。我爱工作就象爱我的生命。人家背后要骂，就让人家去骂吧，反正，右派是被人骂惯了的，听得多了，耳朵也长茧了。

“王管教，你也出来走走吧，闷在屋里多没劲儿。”

我抬头一望，是她，五中队的女会计何秋云。

“嘿嘿嘿……”

我发愣了，她在笑我，无非笑我是个年轻无为的右派，一尊废物点心。

“你这短外套从哪儿买来的？”

我淡淡地答道：“北京。”这有什么可问的！红黄两色线方格俄国呢，青年款式，加上一米七八的个头，从背影看，象个莫斯科大学学生。不常见嘛！……

“你这皮鞋是哪儿的产品？”

我已经很不耐烦了。问这些做什么！女人们几乎都有这个通病，眼睛总是盯在衣着上。说真的，我厌恶！现在，我愁的不是衣着，也不是钱少，而是不懂科学的管教工作。我在祁连山下经历过的劳教生活，那儿一些对待“行政最高处分”的人的态度，叫人寒心，我不能接过他们的枪，我得走进马卡连科的教学大门，从他那儿重新领会人的尊严、勇敢……我在认识自己，也在认识社会；我在读一部《教育学》，也在读一部没有文字的马克思主义《社会学》。

第三章

与其说我们有权防止错误，不如说我们有权不坚持错误。

——伽桑狄

我已有很长一段光阴不是在工作，而是在履行改造地球，其中也包括改造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。我回想起那些生动情节来，常常在叹息中发笑，又常常在笑声中抽泣。很有哲理，很有意义，很有滋味儿。马可·波罗是年轻时出走的，他在威尼斯舍下情人，远渡重洋，爬山涉水，身染瘟疫，好不容易来到了中国，差点丢了生命。可是，他很欢乐，欢乐得简直叫人不可理解。世上竟有这样自找苦吃的“疯子”！

我在祁连山下的鸽子洞农场，和受了“最高行政处分”的人们，天不亮就从黑得象油布一样的被窝中爬出来了，因为太冷，谁也没心肠留恋黎明的瞌睡。

“今天干什么活？”我请示组长。

“还是砍柴禾，一个人一天从一百三十斤增加到一百五十斤，自砍自运，背不回来的不准吃饭，谁要抗拒，死路一条。”组长许宗仁的回答斩钉截铁，毫不含糊。他忠于队长的指示，并不亚于一个班长在战场上忠于连长的命令。

我穿好公家特制的一色劳教黑大衣，扣紧纽扣，收拾几根黑牦牛绳，腰中别一把钢斧，准备出发。

许宗仁是建筑工人，肌肉发达，一次能扛三百斤柴禾，凭着他的牛力，队长指定他当“官”，完全可以镇住这一帮右派和其他坏分子，对完成上级的一切指示也是十拿九稳的。他在建筑工地上当工头时，大白天糟踏了两名女工。“操他妈！明明是两大姑娘拉我，硬说是我侮辱她们。等我出去再找她们算帐。我不信羊不吃麦苗！”他经常这样大喊大叫。

许组长的杀法太狠了，可叹我们这一群知识分子，在他的手中就象苍蝇，说捏死就捏死了。“你交代，你为啥今天少背了一斤柴禾？”收工回来之后，我被他一脚踢倒在地，然后挺身下跪，低头反省。

“你说！”许组长的打手们齐声助威。

天黑下来了，祁连山的雄姿已经看不清楚了，有家的牛羊，一群一群地跟随主人，向它们亲爱的栏圈，懒洋洋而又坦然地走去了。我现在跪在鸽子洞的旷野上，理所应该地接受许组长的惩罚。

“不交代就砸他！”

许组长下了命令。我只觉得头上、背上全是枪林弹雨，不一会便什么都知道了。

“装什么蒜！把他的蒜皮剥下来！”这一句话是我三天后才知道的。

后来，我写了检讨，补上了那一斤差额，总算饶过了我。同时，我追记了这样一篇日记——

真倒霉！好不容易砍了这么多柴禾，手背都出血了，我蛮以为今天能超额，偏偏在向回背运的路上，我

滑了一跤，脚下是一条沟，我连人带柴滚了下去，脸上、腿上都是伤。

我拣呀拣呀，拣了近一个多小时，把柴禾重新捆起。眼看着一块干木头滚到沟底的远处去了，由于天已黑，无法再拣回来，可惜呀！那块木头足有一斤多重，上面还溅着我手上的鲜血，然而，追不回来了。

就是这一块木头，我欠了一斤砍柴任务，招徕许组长对我的批斗。活该！谁叫我下坡时走路不小心呢！

我觉得没有必要向许组长说明这个情况。说了，他也不信，反而会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：“你们这些反动派，就是狡猾。你们是政治犯，我不就是两个姑娘的事吗！……”

我想起这些，是在今天早晨。常管教一上班就大发雷霆，质问昨天的家属接见是谁负责的？象高淘淘这样的流氓犯还能接见女人吗？“日他达！接见纪律被狗吃了吗！你看，他不是把女人照片都弄到监狱里来了吗！上面一再纠正右倾，难道能把犯人当成亲兄弟吗！犯人就是犯人。只准他们规规矩矩，不准他们乱说乱动！……”

常自亮的嗓门特大，吓得窗外杏树、桃树、苹果树上的麻雀都飞走了。办公室就我和他。其他人都到上面开会去了。

我受不了！常自亮几乎是毫不掩饰地在骂人，只是没有点出我的姓名。我象吃进了一只死苍蝇，欲吐又吐不出，肚子胀成一面鼓。

昨天是星期天，也是中队法定的家属接见日，本该女会